

国定贫困县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评价

——基于湖南 20 个县 2006—2011 年的数据

曾志红, 曾福生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以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为基础, 构建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投向结构和来源结构模型, 并运用湖南省 20 个国定贫困县 2006—2011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不同投向和来源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和贡献率都较低, 扶贫资金使用存在结构失调和效率缺失。其中, 科教文卫投入的产出弹性及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较高,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产出弹性和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均为负; 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仍然发挥着主渠道作用, 其产出弹性和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远远高于其他来源渠道。因此, 农村扶贫资金要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应加强投向结构因素、来源结构因素与其他黏合因素的有机协调, 并开辟新的资金渠道, 加大投入, 优化内部结构。

关键词: 扶贫资金; 效率; 投向结构; 来源结构

中图分类号: F81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3)05-0001-06

Evaluation of the rural poverty fund's efficiency of the state-supported poverty-stricken countries: Based on data in 2006-2011 of 20 poverty counties in Hunan

ZENG Zhi-hong, ZENG Fu-sheng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constructed the investment structural model and source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rural poverty fund's efficiency based on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made empirical analysis by using the data in 2006-2011 of 20 state-supported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Huna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 output elasticity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rural poverty funds from different investment and source were low and the structure was imbalance and the poverty funds was inefficient. Among, SECH (Science, Education, Culture and Health) investment got higher output elasticity, meanwhile it was benefit to the growth of rur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however,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growth of rur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which was made by the investment were both negative. The central and provincial poverty relief fund still played the vital role in fighting poverty, its output elasticity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growth of rur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were both higher than other capital channels'. The rural poverty relief fund w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by coordinating organically investment structure factors, source structure factors and other factors, opening up new capital channels, increasing investment and optimizing internal structure.

Key words: the capital of poverty reduction; efficiency; investment structure; source structure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全球性的社会现象, 是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地理生态自然条件差异以及人类个体差异综合的结果。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加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镇化率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重大等因素,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困扰我国的全面发展, 扶贫也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

收稿日期: 2013 - 08 - 14

作者简介: 曾志红(1973—), 男, 湖南邵东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农业政策与理论。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农村扶贫工作的力度:从1980年开始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结束,国家财政预算内安排资金800亿元;近十年我国累计投入农村扶贫资金2043.8亿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10年的2688万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我国政府的开发式扶贫资金投入对解决贫困地区农户的温饱问题和农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显著作用,为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收入水平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但由于2011年贫困标准的提高,我国贫困人口再次回到1.28亿人,由此可见,虽然我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国农村的反贫困任务依然很艰巨。

国内外环境的日趋复杂增加了我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和分配的难度,而资金投向的合理性与否必然影响其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于扶贫效率评价的研究始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对约翰逊政府“大社会计划”和“对贫困宣战”各个项目、法案的政策辩论和评估。国内学者近十年来才开始重视和关注扶贫效率评价的研究。朱乾宇通过政府扶贫资金及其具体投向对提高农业总产值和农民纯收入、降低农村贫困人口及其比例的回归分析,考察了我国政府扶贫资金使用的绩效,认为我国不同形式的扶贫资金的投入具有不同的绩效,其中以工代赈的绩效最佳,而贴息贷款和发展基金的投入使用效果不理想、绩效不佳。^[1]李文和汪三贵认为随着扶贫资金减贫效果的边际效用递减,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必然会发生转移,扶贫资金会愈来愈向西部贫困地区、山区和老少边区倾斜,以进一步提升扶贫资金效率。^[2]姜爱华构建了资金贡献绩效和资金投向绩效两个指标对我国政府开放式扶贫资金投放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以工代赈对减贫有显著效果,而中央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的效果并不明显。^[3]付英和张艳荣以兰州市“三县一区”为样本,从政策相关性、扶贫效率、扶贫效果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建立了贫困地区综合性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总体性和动态性评价。^[4]

虽然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扶贫资金的效率评价问题,但是,理论界“重资金量的投入、轻资金使

用效率评价”研究的现实并没有改变,这很不利于从理论上推动我国农村扶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笔者拟借鉴已有研究成果^[5],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起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模型,分析我国农村扶贫资金的投向结构因素和来源结构因素对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并运用湖南省20个国定贫困县2006-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优化我国农村扶贫资金的投向结构、拓展扶贫资金的来源渠道、促进我国贫困农村居民脱贫致富提供参考。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反映农村扶贫投入产出关系的主要是不同类型扶贫资金或者扶贫资金的不同投向所产生的效益。在这种投入产出关系中,衡量产出的变量主要有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增加值、贫困农户人均纯收入、农户人均GDP等。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采用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作为农村扶贫资金投入的产出效益指标;投入变量主要体现为农村扶贫资金或资本的投入,不考虑其他要素的作用或者是将其他要素看作既定不变的条件。农村扶贫资金使用的投向结构和来源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其使用效率和效益,因此,就形成了基于投向结构变量和来源结构变量影响的两种模型。

1. 投向结构模型

参照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考虑农村扶贫资金投向结构和实施扶贫的国定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5]笔者建立如下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扶贫资金投向结构的函数模型:

$$V = AI_1^\alpha I_2^\beta I_3^\gamma I_4^\theta I_5^\phi \quad (1)$$

式中 V 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 I_1 表示投入到农林及其加工业的扶贫资金, α 为其产出弹性; I_2 表示投入到其他生产行业的扶贫资金, β 为其产出弹性; I_3 表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扶贫资金, γ 为其产出弹性; I_4 表示投入到科教文卫的扶贫资金, θ 为其产出弹性; I_5 表示投入到其他领域的扶贫资金,为其产出弹性; A 表示常数项。

对(1)等式两端分别取自然对数,得到:

$$\ln V = \ln A + \alpha \ln I_1 + \beta \ln I_2 + \gamma \ln I_3 + \theta \ln I_4 + \phi \ln I_5 \quad (2)$$

对(2)等式两边分别求导,得到:

$$\frac{dV}{V} = \frac{dA}{A} + \alpha \frac{dI_1}{I_1} + \beta \frac{dI_2}{I_2} + \gamma \frac{dI_3}{I_3} + \theta \frac{dI_4}{I_4} + \phi \frac{dI_5}{I_5} \quad (3)$$

此时, $\frac{dV}{V}$ 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同时

可以得到各类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

$$Cr_{I1} = \frac{\alpha \frac{dI_1}{I_1}}{\frac{dV}{V}}; Cr_{I2} = \frac{\beta \frac{dI_2}{I_2}}{\frac{dV}{V}}; Cr_{I3} = \frac{\gamma \frac{dI_3}{I_3}}{\frac{dV}{V}}; Cr_{I4} = \frac{\theta \frac{dI_4}{I_4}}{\frac{dV}{V}}; Cr_{I5} = \frac{\phi \frac{dI_5}{I_5}}{\frac{dV}{V}} \quad (4)$$

其他黏合因素的贡献率则为:

$$Cr_A = 1 - Cr_{I1} - Cr_{I2} - Cr_{I3} - Cr_{I4} - Cr_{I5} \quad (5)$$

根据(2)式,利用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农村扶贫资金不同投向的收入或产值弹性 α 、 β 、 γ 、 θ 、 ϕ ,将它们相加就得到农村扶贫资金投入的综合效益。

当 $\alpha + \beta + \gamma + \theta + \phi > 1$ 时,表示随着农村扶贫资金投入的增加,其综合效益提高得更快,规模效益递增。

当 $\alpha + \beta + \gamma + \theta + \phi = 1$ 时,表示随着农村扶贫资金投入的增加,其综合效益同步增加,规模效益不变。

当 $\alpha + \beta + \gamma + \theta + \phi < 1$ 时,表示随着农村扶贫资金投入的增加,其综合效益提高得较慢,规模效益递减。

2. 来源结构模型

同样参照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模型,考虑农村扶贫资金来源结构和实施扶贫的国定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笔者建立如下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扶贫资金来源结构的函数模型:

$$V = BK_1^\alpha K_2^\delta K_3^\lambda K_4^\rho \quad (6)$$

式中 V 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 K_1 表示来自中央扶贫贴息贷款资金, α 为其产出弹性; K_2 表示来自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 δ 为其产出弹性; K_3 表示以工代赈扶贫资金, λ 为其产出弹性; K_4 表示其他来源的扶贫资金, ρ 为其产出弹性; B 表示常数项。

对(6)等式两端分别取自然对数,得到:

$$\ln V = \ln B + \alpha \ln K_1 + \delta \ln K_2 + \lambda \ln K_3 + \rho \ln K_4 \quad (7)$$

对(7)等式两边分别求导,得到:

$$\frac{dV}{V} = \frac{dB}{B} + \alpha \frac{dK_1}{K_1} + \delta \frac{dK_2}{K_2} + \lambda \frac{dK_3}{K_3} + \rho \frac{dK_4}{K_4} \quad (8)$$

此时, $\frac{dV}{V}$ 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同时

可以得到各类扶贫资金来源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

$$Cr_{K1} = \frac{\alpha \frac{dK_1}{K_1}}{\frac{dV}{V}}; Cr_{K2} = \frac{\delta \frac{dK_2}{K_2}}{\frac{dV}{V}}; Cr_{K3} = \frac{\lambda \frac{dK_3}{K_3}}{\frac{dV}{V}}; Cr_{K4} = \frac{\rho \frac{dK_4}{K_4}}{\frac{dV}{V}} \quad (9)$$

其他黏合因素的贡献率则为:

$$Cr_B = 1 - Cr_{K1} - Cr_{K2} - Cr_{K3} - Cr_{K4} \quad (10)$$

根据(7)式,利用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农村扶贫资金不同来源的收入或产值弹性 α 、 δ 、 λ 、 ρ ,将它们相加就得到农村扶贫资金来源的综合效益。

当 $\alpha + \delta + \lambda + \rho > 1$ 时,表示随着不同农村扶贫资金来源的增加,其综合效益提高得更快,规模效益递增。

当 $\alpha + \delta + \lambda + \rho = 1$ 时,表示随着不同农村扶贫资金来源的增加,其综合效益同步增加,规模效益不变。

当 $\alpha + \delta + \lambda + \rho < 1$ 时,表示随着不同农村扶贫资金来源的增加,其综合效益提高得较慢,规模效益递减。

3. 数据来源

湖南省是我国中部的农业大省,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较为典型,国定贫困县也较多,同时也是中央批准的“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笔者认为,以湖南省为例研究我国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文以湖南省所有的20个国定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选择湖南省统计局提供的这20个国定贫困县2006—2011年的农村扶贫资金投入、来源及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等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三、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计量分析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1可知,2006—2011年间,湖南省国定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自然对数的平均值为7.7482、中位数为7.7321、标准差为0.2279、最大值为8.2978、最小值为7.3018,这些数据表明贫困县的

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不大,绝对数额相对较低,并且呈现一定的右偏分布。从农村扶贫资金使用的投向结构数据来看,农村扶贫资金投入领域的自然对数平均值最大的是农林及其加工业,达 8.105 3,最小的是其他生产行业,为 3.068 5,二者相差 1.64 倍;中位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也是农林及其加工业和其他生产行业,分别为 8.231 4 和 3.632 0,二者相差 1.27 倍;五个投向结构变量数据都表现出较大的离散程度,标准差都在 0.5 以上,特别是其他生产行业和其他领域的投资标准差分别达到了 3.170 8 和 1.493 0,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达到 8 以上;农林及其加工业、其他生产行业和其他领域的扶贫资金投入呈现左偏状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卫

领域的扶贫资金投入则呈现右偏状态。从农村扶贫资金使用的来源结构数据来看,在不同来源结构中的农村扶贫资金自然对数值,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的均值最大,达 8.403 2,其次是以工代赈扶贫资金,为 6.684 5,然后依次是其他来源资金和中央扶贫贴息贷款,分别为 6.200 4 和 4.483 4;来源结构数据的离散度整体情况较高,但是四个来源结构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中央扶贫贴息贷款和其他来源资金的波动更大,两项资金来源的标准差分别为 3.359 1 和 2.851 5,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达 8 以上;四项资金来源在分布状态上都呈现出一致的左偏性。

表 1 农村扶贫资金投向结构和来源结构数据

变量类型	变量名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ln V$	8.297 8	7.301 8	7.748 2	7.732 1	0.227 9
投向结构变量	$\ln I_1$	9.495 0	5.283 2	8.105 3	8.231 4	0.826 3
	$\ln I_2$	8.893 4	0	3.068 5	3.632 0	3.170 8
	$\ln I_3$	9.504 2	4.852 0	7.396 9	7.259 7	0.769 5
	$\ln I_4$	8.739 2	3.729 1	5.682 1	5.465 9	0.871 9
	$\ln I_5$	9.398 1	0	7.113 8	7.472 2	1.493 0
来源结构变量	$\ln K_1$	8.787 5	0	4.483 4	6.214 6	3.359 1
	$\ln K_2$	9.688 8	6.461 5	8.403 2	8.505 5	0.714 4
	$\ln K_3$	8.091 0	6.021 0	6.684 5	6.779 0	0.547 4
	$\ln K_4$	9.728 4	0	6.200 4	7.150 5	2.851 5

2. 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回归检验

由于本文样本是典型的面板数据,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以及个体特征因素对回归结果的不当影响,本文采用 GLS 估计方法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见表 2 和表 3。

表 2 不同投向的农村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回归

解释变量	系数值	Z 值	VIF 值
<i>cons.</i>	7.460 7***	35.22	-
$\ln I_1$	0.031 2*	1.70	1.255
$\ln I_2$	-0.007 5*	-1.70	1.077
$\ln I_3$	-0.035 5*	-1.71	1.382
$\ln I_4$	0.051 2***	2.86	1.371
$\ln I_5$	0.026 5***	2.61	1.428
R^2 值	0.580 9		
<i>wald</i> 值	132.56***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3 不同来源农村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回归

解释变量	系数值	Z 值	VIF 值
<i>cons.</i>	5.801 7***	25.13	-
$\ln K_1$	0.015 8***	3.40	1.254
$\ln K_2$	0.211 5***	8.58	1.623
$\ln K_3$	0.036 8*	1.71	1.187
$\ln K_4$	-0.024 0***	-4.07	1.152
R^2 值	0.4522		
<i>wald</i> 值	103.19***		

(1) 农村扶贫资金投向结构效率的回归检验。

由表 2 可知,利用 GLS 估计方法的随机效应模型对(2)式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回归方程:

$$\ln V = 7.460 7 + 0.031 2 \ln I_1 - 0.007 5 \ln I_2 - 0.035 5 \ln I_3 + 0.051 2 \ln I_4 + 0.026 5 \ln I_5 \quad (11)$$

其系数的 R^2 值为 0.580 9,方程的 *wald* 值达到 132.56,因此,据此方程进行评价,结果具有高的可靠性。从式(11)可知:投入农林及其加工业扶贫

资金的产出弹性 α 为 0.031 2,投入其他生产行业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 β 为-0.007 5,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 γ 为-0.035 5,投入科教文卫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 θ 为 0.051 2,投入其他领域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 为 0.026 5。结合公式(4)和(5)得出不同投向结构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农林及其加工业的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0.271%,其他生产行业的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0.453%;基础设施建设的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48%,科教文卫的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5.652%;其他领域的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12.46%,其他黏合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89.186%。

(2)农村扶贫资金来源结构效率的回归检验。由表 3 可知 利用 GLS 估计方法的随机效应模型对(7)式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回归方程:

$$\ln I = 5.8017 + 0.0158 \ln K_1 + 0.2115 \ln K_2 + 0.0368 \ln K_3 - 0.0240 \ln K_4 \quad (12)$$

其系数的 R^2 值为 0.452 2,方程的 *wald* 值达到 103.19,因此,据此方程进行评价,结果具有高的可靠性。从式(12)可知:来自中央扶贫贴息贷款资金的产出弹性 φ 为 0.015 8,来自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 δ 为 0.211 5,来自以工代赈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 λ 为 0.036 8,来自其他来源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 ρ 为-0.024 0。结合公式(9)和(10)得出不同来源结构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中央扶贫贴息贷款资金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0.029%,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30.577%,以工代赈扶贫资金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1.766%,其他来源扶贫资金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0.952%,其他黏合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68.58%。

四、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知,我国农村扶贫资金的投

入领域和来源渠道的产出弹性都不高,我国扶贫资金使用的整体规模效益低下,特别是投入领域的产出弹性甚至在 10%以下。五个投向结构因素的产出弹性合计只有 0.065 9,四个来源结构因素的产出弹性合计也只有 0.240 1,两类产出弹性都远小于 1,根本谈不上扶贫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因此,要使我国扶贫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得到充分的发挥,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和落实农村扶贫资金的使用途径,切实发挥农村扶贫资金提升农民收益的主导作用。

在投向结构因素中,相比其他因素,科教文卫投入的产出弹性最高,达到了 0.051 2,其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也较高,达到了 5.652%。这说明贫困县历年来在科教文卫方面的投入较少,基础薄弱,贫困县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卫生医疗条件已难以适应现代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大对贫困县农村科教文卫方面的投入,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给农民送科学、送技术、送思想,进而提升农民创业和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其经营致富的本领。特别是要将国家开展的“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星火科技培训专项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与农村扶贫紧密结合起来,塑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通过加大扶贫资金在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让广大贫困农民病有所医,并且医不致贫。在投向结构因素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产出弹性为负(-0.035 5),其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也为负(-7.48%)。说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扶贫资金对贫困县农民的收入增长不仅没有贡献,反而表现出不利影响。贫困县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资金支出主要用于具有全社会性质的基本农业建设、道路修建、人畜饮水工程和生态环境保护性建设,从理论上讲,可以有效降低自然环境变化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善投入与产出质量,降低农户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值,提高农户收益。

现实中表现出的显著不利影响,充分表明当前农村扶贫资金在该领域中的安排和使用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调和效率缺失,大量的资金投入并没有转化为贫困县农民收入的改善和增长。

在来源结构因素中,不同来源渠道的扶贫资金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仍然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其产出弹性为 0.211 5,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达到了 30.577%,都远远高于其他来源渠道。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资金的 13.39 倍,是以工代赈扶贫资金的 5.75 倍;其贡献率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资金的 1.054 倍,是以工代赈扶贫资金的 17.31 倍。由此可见,财政扶贫资金在农民增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财政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和贡献率仍然处在一个较低水平,二者都没有达到 50%甚至 100%以上,这说明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急需改革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促进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必须改进农村扶贫资金的来源结构,进一步加大重要扶贫贴息贷款资金和以工代赈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充分协调和发挥不同来源渠道扶贫资金的合力,促进贫困农户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从投向结构模型和来源结构模型的整体贡献率来看,目前农村扶贫资金的投向领域和资金来源渠道都没有对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产生主导性正向影响,其他黏合因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切实使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就必须做到:一是加强农村扶贫资金的投向结构因素、来源结构因素与其他黏合因素的有机协调性,促进投向结构因素和来源结构因素贡献率的提高,最终使共同作用最大化;二是开辟农村扶贫资金渠道,加大投入,优化内部结构,提升投向结构因素和来源结构因素的整体贡献度。

参考文献:

- [1] 朱乾宇. 政府扶贫资金投入方式与扶贫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4(7): 11-15.
- [2] 李文, 汪三贵. 中央扶贫资金的分配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8): 44-48.
- [3] 姜爱华. 我国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投放效果的实证分析[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8(2): 13-18.
- [4] 付英, 张艳荣. 兰州市扶贫开发绩效评价及其启示[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2(5): 25-30.
- [5] 王碧玉, 李树吉, 李成红. 财政扶贫资金效益评价模型的构造及其应用研究[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5(4): 75-77.

责任编辑: 李东辉